

文明史视域下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魏志奇, 朱权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必然性, 即中华民族必然要在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中选择发展道路, 在把握中华文明创新性中坚定道路自信, 在把握中华文明统一性中深化道路认同, 在把握中华文明包容性中拓宽道路视野, 在把握中华文明和平性中彰显道路文明。中华文明中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价值取向,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观、民本观、经济观、生态观和世界观。中国道路中蕴含的文明理念、文明实践和文明追求, 凸显了其在“人本逻辑”“和谐共生”“和平发展”“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等方面相较于西方道路的独特优势。

关键词: 中华文明; 中国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独特优势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4-0132-13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中国历史的探究、对中华文明的追溯与对中华文化的弘扬, 并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内在关系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我们从文化与文明视角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色, 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 这里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特色, 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既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 也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 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是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和文明底蕴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与文化资源赋予了中国特色最深刻的内在规定性, 只有开拓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宏大视野, 为中国道路研究赋以文明建构新范式, 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 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文明魅力, 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彰显中国道路相较于西方模式的独特优势。因此, 从文明史的视角审视中国道路, 深入挖掘中国道路背后更加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更为深厚的文明底蕴, 对于激发中华文明的历史自觉, 坚定中华文化和中国道路的历史自信, 揭穿“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历史终结论”的话语骗局, 打破西方文明与西式道路的历史迷思,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24-03-09; **修回日期:** 2024-06-16

基金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论述研究”(21LLMLB055)

作者简介: 魏志奇, 男, 甘肃白银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联系邮箱: weizqxbsd@163.com; 朱权辉, 男, 河南周口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文明史视域下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指出, 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而要“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69)}。中国道路不是在历史真空中诞生的, 从中华文明及其突出特性来看, 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和内在的文化规定性。“数千年来, 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3]

(一) 在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中选择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1]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话语叙事内含了中国人民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背后的文化根基与底层逻辑。

从文明连续性及其表征来看, 中华文明及其连续性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国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 进而在决定中国人民选择中国道路中焕发出强大影响力和内在规制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地理疆域的连续性、政治实体的连续性、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语言文字的连续性、史学记忆的连续性等方面。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核心地域范围, 到夏、商、周……元、明、清等历史朝代轮换, 从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思想巨匠诞生, 到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思想文化传承, 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汉字七体”的完整演化过程, 到《史记》《汉书》《后汉书》……《清史稿》等“二十六史”的连续记载传统, 都完整演绎和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 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璀璨辉煌的学术思想和文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4]。那些本质不变而内容常新的文化基因构筑了中华民族世

代认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从文化主体性及其影响来看, 中国道路的形成“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动力, 这一精神动力恰恰存在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5], 有了文化主体性, 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与道路的选择“有其民族内部的历史脉动和规律性”^[6]。晚清以来, 面对“西强我弱”局势下的“西学东渐”, 很多中国人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全盘西化,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 全盘西化解决不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中国的前途在于批判性继承本民族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的基础上, 要不断激活和重塑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文化相结合, 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实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成功突围”, 这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及其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简言之, “中国走上这条道路, 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7]。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进而决定了中华民族拥有异于西方文明和西式道路的原生性、独立性与自主性, 为近代中国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 “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8]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 在把握中华文明创新性中坚定道路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 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1]中华文明之所以被称为“从未断裂的文明”, 正是因为其具有革故鼎新、锐意进取的优良传统与优秀基因。党和人民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及其创新性的基础上, 不断开创着中国道路新局面, 持续巩固着中国道路自信心。

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不仅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 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焕发出巨大的实践伟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不断塑造和持续巩固着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道路的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9]中国

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不断扬弃和传承创新中走出来的,凸显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5 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10]“两个结合”的伟大创造,既以传承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征为文化基础,又以新时代党和人民坚定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为具象表征。一方面,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得以开创和形成的。“第一个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同时,不是囿于“本本”式的教条主义,而是进行理论创新和思想改造,在遵循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11]原则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结合起来,把俄国“从城市到农村”的革命经验,创新性地改造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它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文化根基,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概言之,“中国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自主独创的”^[12]。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中华文明创新性中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发展和伟大飞跃,不断增强和提振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道路自豪感、认可度和自信心。

(三) 在把握中华文明统一性中深化道路认同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赋予了中华民族追求山河统一、文化一体、民族团结的厚重底色和不变基因,并最终沉淀为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衷接受和深度认同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新路,党和人民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走过一些弯路,经历了严重挫折。特别是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我国内部面临着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外部陷入“共产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的舆论漩涡,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历史地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13]。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部分中国人民和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的悲观情绪与错误判断,党和国家亟须对“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看待中国道路的发展模式”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作出回答。现实地看,中国共产党不仅给出了令中国人民十分满意的答案,而且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史性地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时代课题,是因为我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传统为我们选择中国道路、深化道路认同提供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华文明因秉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1]的共同信念,塑造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共同体理念,巧妙地将其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贯通起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道路是契合中华文明统一性、符合中国人民心理预期的正确道路。它不仅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该“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也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蒙辱”“蒙难”“蒙尘”的屈辱历史,更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换言之,中华文明及其统一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行动力,也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深化道路认同的最大底气。

(四) 在把握中华文明包容性中拓宽道路视野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形成了兼收并蓄、包罗万象、和合共生的多元文化体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基础上,超越宗教信仰、跨越文明鸿沟、淡化

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对立,不断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借鉴吸收各国发展经验,奋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持续拓宽了中国道路发展的宏阔视野。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从“华夷一体,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态度。“中国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流、借鉴,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而形成的多元复合性文化,有着悠久丰富的文化包容性和亲和性”^[14]。因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开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同样具有强大的包容特性,它不会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对立而放弃对其他文明成果、优秀文化、发展经验的置换与兼容。从毛泽东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5],到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6](373)},再到习近平提出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17]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和发展经验,不断拓宽中国道路发展视野。质言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赋予了中国道路交流互鉴、兼收并蓄、和合共生的文明特质,使其呈现出胸怀天下的品质、大国担当的责任、求同存异的智慧,“既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智慧,又拥有立足世界宽阔视野,化解人类文明冲突的现代指向”^[18]。

(五) 在把握中华文明和平性中彰显道路文明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集中表现为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理念,是镌刻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赋予了中国道路“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与“和而不同”的文明内涵,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观念和传统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19]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诸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化干戈为玉帛”“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等和平理念是中国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深深印刻在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形成了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等一系列关系的基本法则。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和平理念赋予了中国道路与众不同的文明内涵,注定了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次提出,到新时期“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科学研判,再到新时代“和平之狮、可爱之狮、文明之狮”的生动阐释,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中华文明的和平特性,提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探索形成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20]的新型文明道路。具言之,中国道路是“第三新文明”^①,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蕴含着和平、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今天的中国道路正以不断丰富的文明理念、文明实践和文明追求,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着思想指引和文明镜鉴。

二、文明史视域下中国道路的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文明是中国道路开辟之“源”、拓展之“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和运用中华文明视角,深入研究阐释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21]。作为最重要的、与中国道路最契合的思想理念,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价值取向、经济伦理、生态理念、社会理想、交往之道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道路的实践观、

民本观、经济观、生态观、世界观、处世观,代表了中国道路的文化之“基”、力量之“源”。

(一)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道路的实践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理论因子和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内在耦合性,是中国道路深厚的文化底色。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思维特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价值取向。“实事求是”最早见诸《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22]“知行合一”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王阳明,他从“知行本体”“知行体段”^[23]的角度论证并阐明了“知行合一”的价值理念与科学内涵。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演化与历史积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已经由古代文人的治学之道、平民百姓的本然秩序演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思想资源和独特价值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实事求是”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一方面,在内涵上,前者是指考证经典文本时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而后者是指洞察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并恰当地把握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时机,是一种“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众、只唯实”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另一方面,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人们探寻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本源的态度与方法,前者为后者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与精神“基因库”,后者赋予前者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并将其作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道路的制胜法宝。

中国道路是“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24](68)}。从毛泽东“以苏为鉴”“以苏为戒”,艰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到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

探索和实践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5],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根据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发展对其思想理论、路线方针、组织原则进行及时调整,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26]总之,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中,内化为中国道路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内涵,也在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不断交融中进行着良好的互动与对彼此的完善。

(二)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价值取向与中国道路的民本观

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念,它既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相通,又与中国道路的根本价值取向相融。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发展中国道路的进程中,灵活地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政治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道路的文化内涵。

中国道路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价值理念,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道路的文化内涵。从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以“德治”“仁政”“民贵君轻”“以百姓心为心”“兼爱”“非攻”为主要内容的治国理念,再到明清时期黄宗羲提出“万民忧乐”是衡量盛世乱世的唯一标准,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墨法道等各家思想为一体的民本思想体系。虽然传统民本思想有

着不可跨越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爱民、利民、恤民的执政理念彰显了我国古代重视民众、以人为本的政治思想,对我国形成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道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形成了科学、系统的民本观。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强调人民是创造人类历史的主体,并将自己对人民朴素而真挚的感情凝练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信条,将其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7]一个国家及其所走道路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道路始终把“人民需求”作为价值导向,将人民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和一切活动的行为准则,充分彰显了浓厚的民本思想与深沉的人本逻辑。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24](68)}。中国共产党今天形成并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国方略,“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一种全新的民主方式维护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刻体现了中国道路丰厚的文明根基与文化根底。

(三)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与中国道路的经济观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有关治国理政、经邦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安邦定国的民生基石,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深刻地体现为富民为始的治国之道、均平扶弱的损益之

道、重义兼利的索取之道,是我国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渊源。“富民厚生”理念脱胎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并由此衍生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领域极为重要的哲学论题,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对义利的争辩,到明清之际提出“义利并重,不讳功利”的义利观,我国逐渐形成了义字当先、义利兼顾的伦理观念。中国道路既以经济发展、物质丰富为基础,又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为目的,正是对“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和实践。

我国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将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保障,将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赋予“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这一传统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是中国道路文化内涵的具象呈现。中国道路“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16](364)}的分化之路,而是“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8](22)},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共富之路。中国道路不仅强调共同富裕,而且还把共同富裕的内涵从物质领域拓展到精神领域,从而使社会全体成员最终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里所说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包含了对“富民厚生”的追求,又囊括了对“义利兼顾”的坚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本质的要求和最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样,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不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诸如此类的思想、政策、方针、制度、举措都深刻反映了中国道路蕴含的人民立场、富民思想和义利情怀。

(四)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与中国道路的生态观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作为中华文明的智

慧结晶和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道路始终坚持和践行的生态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生态制度的文化内核。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态思想的直接文化资源,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我国古代先贤对“天人关系”“人地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儒家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使民以时”“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等观点,主张按照自然规律进行农耕生产,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佛教提出“依正不二”“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的思想主张,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家提出“人法天,天法地,道法自然”,主张人应该按照天地规律办事,但同时也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畸于人而侔于天”“赞天地之化育”的和谐共生状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明显的生态向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重要特征和深刻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看作“自然之子”、自然的产物,并将自然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同时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以达到两者之间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与我国文化中强调遵循“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原则,达到“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的境界高度契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的中国道路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理念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创新的成果,从倡导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时期到推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时期,再到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国道路生态观的发展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提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道路的生态观,形成了包括“生命共同体论”“绿色发展论”“两山论”“美丽强国论”“生态生产力论”“生态文明观”“生态民生观”“系统治理观”“严密法治观”“全球治理观”等在内的原创性生态治理思想。总之,中国道路继承“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借鉴“仁爱自

然”“敬畏生命”的文化资源,践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有效方法,在现代化进程中将遵循自然规律与保障人的生态权利高度统一起来,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不断丰富了中国道路的生态理念与文化内涵。

(五)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中国道路的世界观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一直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政治思想,也始终是底层人民向往的理想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于大同社会的构想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并在今天内化为中国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邃思想和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执着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天下观是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的文化土壤。“天下”“大同”的概念源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9](286)}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总的秩序要求,承载了中国人对家国天下的理解、对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愿景。虽然我国文化中“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30]的朴素天下观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其中蕴含的社会理想追求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种千年一系而又有所损益的政治传统,逐渐定格为中国特色政治秩序的基本内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灵魂。

中国道路追求的是“阶级尽扫,人人皆为平民”^[31],财产公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道路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极致的人文关怀。中国自古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32](201)}的文化传统,中国道路继承了这种胸怀天下的理念,是一条“计利当计天下利”^{[32](177)}的大同之路,“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33]。不仅如此,中国道路还从整个世界的利益出发想问题、办事情,致力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发展的全球倡议,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总之,中国道路对内以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政策,对外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奋斗目标,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呈现,有着坚实的思想、文化和文明根基。

(六)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与中国道路的处世观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符号,蕴含着中国人民对和谐社会秩序的普遍追求,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和持久影响力,与我国始终坚持的睦邻友好周边外交政策有着高度的契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价值理念。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是我国古代追求良好社会秩序、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构建良好地缘格局的重要体现。讲信修睦一语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34],它主张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应该讲究信用,修习和睦相处之道,是古代普遍适用的基本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亲仁善邻”源于左丘明《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29][268]}它主张一个国家应该亲爱仁义、和睦邻国,是我国古代实现长治久安的良策。一言以蔽之,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深谙“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的处世之道,提倡“远亲不如近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邻里修好,守望相助”的交往之道。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闪耀着中华文明独有的处世之道与智慧光芒,是我国制定周边外交政策、开展周边外交工作、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思想渊源。从新中国成立初推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到新时期制定“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对外战略总目标,到新世纪确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再到新时代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我国始终坚持和奉行睦邻友好、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交往之道,为我们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来源于对自身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和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也来源于中华文明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总之,“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在中国道路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在当今世界面临“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印巴冲突”“朝韩矛盾”的动荡局势下,显得尤为可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传承好、发扬好、运用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老智慧,将其外化于党和国家处理地缘政治问题的外交理念,熔铸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要义,与周边国家一道,携手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三、文明史视域下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世界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明、文化传统和发展走向,并在不同文明形态中彰显着各自显著的文化优势。与主张资本逻辑、主客二分、零和博弈、个人至上、物欲膨胀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秉承的是“以人为本”,提倡的是“天人合一”,推崇的是“以和为贵”,坚守的是“共同富裕”,追求的是“全面发展”。这些宝贵的价值理念与价值追求,使得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能够获得最为深厚的文化支撑、最为显著的独特优势。

(一) 逻辑起点维度:“人本”之于“资本”

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决定了中国道路“人本逻辑”相较于西方道路“资本逻辑”的显著优势。

西方道路是典型的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模式,其本质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生产逻辑,其现代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与“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相对

立”^[35]，长期忽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异化、物役化和片面化等问题。在此种社会形态下，国家权力成为资本的“拐杖”，国家沦为资本家敛财的工具，二者的联合形成了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与绞杀，使其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的工人”^②。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影响，中国道路是以“人本”逻辑代替了“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扬弃了资本逻辑和资本现代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真正做到了实现人和发展人，它的远大理想和未来指向是共产主义，“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主义构想的成功实践，内含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两个标准，前者决定了必然要利用和引导资本，后者又要求一定要防范和规制资本。中国道路坚持将“以人为本，为民谋利”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尺度和衡量标准，在利用资本实现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同时，“不断将资本、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等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库’中剥离出来”^{[37](274)}，并运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将资本控制在经济领域内，防止资本向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渗透，让“资本”成为实现经济发展的工具，成为达到“人本”目的的手段。

(二) 生态理念维度：“共生”之于“对立”

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思想根源。从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国请到人间”，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自主性的挖掘，西方开始从崇拜“神”，即崇拜自然界逐渐转变为“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自然界则是与‘自我’相对立的‘他者’，是没有‘理性’和‘内在价值’的无生命存在”^[38]，只能当作人类任意索取的“资源库”和随意排放的“污水池”，并萌生了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这就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把人视作完全独立于自然的绝对主体，在利益的驱使下毫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和破坏自然，“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39]，使“纯粹的自然”变为“人化的自然”。对此，恩格斯指

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0](769)}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因资本逐利而产生的对自然索取的无限性成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最后的结果则是人的肮脏、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41]。

与西方道路不同，中国道路顺承中华文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象性范畴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55-56)}，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思想的精髓，在世界观与方法论、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中消除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异化。从东西方发展道路背后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超越了西方工具理性以技术视角看待环境的局限”^[42]，表现出一种在哲学与文化层面上的独特优势。也就是说，中国道路是在工具价值、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相统一的视角下思考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的，反对主客二分式的人与自然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命运与共的良性互动，创造性地提出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意涵的生态文明新论断，实现了对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老旧思维模式的超越，彰显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显著优势。

(三) 发展模式维度：“和合”之于“零和”

与西方文明信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和“国强必霸”的社会进化论不同，中华文明奉行的是“和合共生”“以和为贵”与“和平发展”的社会共生论，由此衍生出的中国道路恰恰超越了西方模式，在“治国”之上还有“平天下”的广袤志向和历史抱负。

从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如果说西方文明“零和博弈”的霸道政治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在不断地制造“假想敌”，那么中华文明“正和博弈”的王道政治就是在不断地结交“真朋友”。受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影响，西方习惯于

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的思维出发, 并生发出诸如“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敌对意识, 这必将导致以邻为壑的对峙格局, 严重破坏世界的和平秩序; 而中国则习惯于从“正和博弈”与多元一体的思维出发, 化干戈为玉帛、变天涯为比邻, 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一直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推动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秩序的形成, 其本质上是资本统治下的弱肉强食的霸权体系”^{[37](266)}。那些一向以文明自诩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世界动荡不安的罪魁祸首, 他们蛮横无理、横行霸道, 肆意欺压剥削侵占他国的种种行为, 不仅是野蛮和不文明的表现, 更体现了西方“零和博弈”的霸权思维。对此, 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在其著作《文明及其内涵》中指出, 就西方人而言, 经济上的贪婪、传教的渴望和科学求知的探索热情推动着他们跨越边界, 甚至不惜以战争野蛮征服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散播出去, 而中国从未想过入侵世界上其他地区。换言之, 中华文明一直是崇尚和谐的文明,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继承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上开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超越了强权政治、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国强必霸的陈旧范式, 是一条文明之路、和平之路。中国道路有着强烈的文明自觉意识, 始终秉持和平相处、和睦友好、和合共生的道义性, 主张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3](48)}。

(四) 价值追求维度: “共富”之于“分化”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压迫和奴役的制度”^{[44](651)}, 在那里资产阶级垄断一切创造财富的手段, 让人们在“粗野和道德堕落”^[45]中逐渐“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40](148)}, 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并最终演化为阶级之间的仇恨、对抗与冲突。与之不同的是, 中华文化中长期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理念和“权有无, 均贫富”的共富主张, 中国道路追求的是“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 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 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44](652)}, 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308)}, 以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事实上, 中国道路内含两种根本尺度, 即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 这两种根本尺度的衡量标准就是社会的贫富差距, 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历史尺度要求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价值尺度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体现社会主义价值, 让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 而不是成为贫富两极分化的杠杆, 因为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更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理念和共富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不断从“天下均平”的朴素思想、“为富当仁”的道德取向、“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中汲取智慧, 以坚决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贫困的艰巨任务, 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中国道路的价值追求。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道路虽然坚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43](165)}, 但其所坚持的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财富的富裕, 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有, 不只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富裕, 而是不落地一村一户一人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超越了西方少数集团狭隘的单一财富追求和两极分化, 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越性。

(五) 均衡发展维度: “协调”之于“畸形”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28](22-23)}与西方文化传统主导下的工业文明既有形态对于物质财富无限扩张的本质不同, 中国道路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道路。

西方道路在商品拜物教的支配之下, 人们的精神世界被严重挤压。在社会大生产中, 资产阶级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权利和无可比拟的资本, 将整个社会笼罩在物质的阴霾之下, 把原本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利益关系。他们以一种全新的自由, 即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调动所有

人的物质欲望并将其“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403)}；他们用一种所谓的享乐主义“福音”抹杀了人们的本性，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46]，使人们丧失了自由精神世界这一特性。人们在这种压抑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逐渐变得窒息，人自身及其与外界的一切关系被物化和异化，成了“单向度的人”“大地上的异乡人”“现代文明的囚徒”。从唯物史观看，西方拜物主义及其精神之殇，物质主义立场及其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虚无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是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精神荒漠”。^[47]

与西式道路的畸形发展不同，中国道路追求的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48]。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形态应当注重个人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49]中国道路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及其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中关于物质与精神并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思想精髓，“不是要在单一维度实现现代化，而是要全面地实现现代化，即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的发展”^[50]，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国家单方面强调“物质”而忽视“精神”的畸形发展之路。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实现了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同步的目标，而且实现了物质丰富与精神富有相统一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充分彰显了中国道路相较于西方模式的显著优势。

四、结语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古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明基因，蕴藏着宏伟的“中国思想”“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看待世界的独特价值体系，并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判断与历史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样的文明理念、文明实践和文明追求中一步步探索、开辟和发展起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今天坚持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就绝不能丢掉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数典忘祖就等于抛弃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根”和“魂”，脱离本民族文化、脱离具体国情、脱离马克思主义，最终会犯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颠覆性错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无比坚定，但我们依然面临着重大风险挑战，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从未停歇，诱导我们改旗易帜的图谋从未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到关键时候，“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的历史启示就越发引人深思，也正是基于此，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中国道路”上升为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引向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历史深处”，则是对这一根本经验的进一步回答，也是最新回应。这正是本文聚焦的核心问题。总之，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文明和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4](46)}，是我们持续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气。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明和传统文化优势，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和人民才会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注释：

- ① “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参见李大钊《东

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 第311页。

- ②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家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找到自由的工人时指出: “这里所说的自由, 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 工人是自由人, 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 另一方面, 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 自由得一无所有, 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164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4-17.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84.
- [4]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81.
- [5] 朱汉民. 文化主体性与“第二个结合”[J]. 哲学动态, 2023(11): 5-12.
- [6] 张诚. 文明与革命: 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2.
- [7] “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N]. 人民日报, 2022-10-19(1).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16.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13.
- [10]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N]. 人民日报, 2023-06-04(1).
- [11]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44-845.
- [12] 郭建宁. 中国道路的内涵与意义[J]. 江海学刊, 2020(2): 55-59.
- [13] 胡锦涛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576.
- [14] 邴正. 社会文化结构特点与中国道路选择[J]. 江海学刊, 2020(2): 48-51.
- [1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06.
- [16]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7]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03-16(2).
- [18] 雷江梅, 王武喆. 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道路化解文明冲突的新智慧[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7-24.
- [19]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1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70.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46.
- [21]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 求是, 2022(14): 4-8.
- [22] 高辉.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⑧[J]. 新湘评论, 2023(14): 25.
- [23]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 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3-4, 176.
- [2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9.
- [26] 习近平.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N]. 学习时报, 2012-05-28(1).
- [27] 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2.
- [2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9] 张绍元, 李晓慧. 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读本[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
- [30] 左鹏, 等. 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54.
- [31] 康有为. 大同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85.
- [32] 人民日报评论部. 习近平用典: 第一辑[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
- [33]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77.
- [34] 中共中央党校“中华文化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M].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23: 102.
-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35.
-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
- [37] 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 中国道路是如何成功的?[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2.
- [38] 曾嵘, 王立胜.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 现代化[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17-27.
-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88.
-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25.
- [42] 赵建军. 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J]. 中州学刊, 2023(1): 12-17.
- [43]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45] 资本论: 节选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208.
-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519.
- [47] 朱香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J]. 红旗文稿, 2022(3): 27-29.
-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30.
- [4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9.
- [50] 林于良. 论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J]. 理论导刊, 2021(10): 47-51.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Chinese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WEI Zhiqi, ZHU Quanhui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ontinuity, innovation, un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undamentally determine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Chinese road, that is, the Chinese nation must choose the development path in grasping 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trengthen the road confidence in grasping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epen the road identity in grasping the un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roaden the road vision in grasping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ighlight the road civilization in grasping the pe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rule of virtue, the economic ethics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ll things, and the social ideal of the world as the public and the great harmony of the world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and shaped the practice view, people-oriented view, economic view, ecological view and world view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ivilization concept, civilization practice and civilization pursuit contained in the Chinese road highlight its unique advantages over the Western road in terms of "humanistic logic," "harmonious coexistence," "peaceful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roa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unique advantages

[编辑: 郑伟]